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新闻传播学

新视界译丛

陈卫星 主编

# Cultur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rratives, Natives and Tourists

## 文化与国际关系 叙事、本地人和游客

[英] 朱莉·里夫斯 (Julie Reeves) 著

朱振明 郭之恩 译

海外借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Culture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Narratives, Natives and Tourists

# 文化与国际关系

## 叙事、本地人和游客

[英] 朱莉·里夫斯 (Julie Reeves) 著

朱振明 郭之恩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文化与国际关系: 叙事、本地人和游客/ (英) 朱莉·里夫斯 (Julie Reeves) 著; 朱振明, 郭之恩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rratives, Natives and Tourists  
ISBN 978-7-5080-9346-8

I. ①文… II. ①朱… ②朱… ③郭… III. ①国际关系史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7220号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rratives, Natives and Tourists, first edition

By Julie Reeves / 9780415459846

Copyright ©2004 by Routledg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n imprin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华夏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14-8308号

本书获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 新时代科学研究创新团队支持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CUC18CX01

## 文化与国际关系: 叙事、本地人和游客

作 者 [英] 朱莉·里夫斯

译 者 朱振明 郭之恩

责任编辑 陈迪 许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鲁数码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京鲁数码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89.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 文化与国际关系：叙事、本地人和游客

朱莉·里夫斯 (Julie Reeves)

文化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非常流行而有力的概念，尽管这一点常常不被认可。文化虽然曾被用来促进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不过在冷战后它却成了生活方式冲突的代名词。《文化和国际关系：叙事、本地人和游客》就是从国际关系（IR）角度出发来对文化观念的发展进行审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文化远不是一个可以被忽略的主题，它在整个历史学科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在这本书中指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概念（人文主义和人类学），并采用语境方法论来追溯其含义在 20 世纪从文化帝国主义到文化冲突的演变。这部创新性著作考察了文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应用，作者用自己的观点挑战了国际关系中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与流行的观点及某些著名的国际理论不同的是，她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是存在”的说法并不是自明的。书中所说的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人及其在当代世界中的差异，值得所有与国际关系相关的工作者借鉴。

朱莉·里夫斯曾在坎特伯雷肯特大学和南安普顿大学研究国际关系。最近她在白俄罗斯州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研究公民教育项目。

献给大卫，怀念戴安娜·里夫斯

## 目录

|               |     |
|---------------|-----|
| 鸣谢            | 001 |
| 导论            | 005 |
| 目的和说明         | 010 |
| 语境化方法         | 013 |
| 叙事、本地人和游客     | 018 |
| 关键点           | 022 |
| 第一章 文化的教化使命   | 023 |
| 礼仪、文化和文明      | 024 |
| 种族和进化论思想      | 036 |
|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关系 | 041 |
| 关键点           | 054 |
| 第二章 文化国际主义    | 055 |
| 文明的脆弱性        | 056 |
| 智力和文化交流       | 061 |
| 文化关系的制度化      | 069 |
| 文化交流问题        | 079 |
| 关键点           | 086 |

|       |              |     |
|-------|--------------|-----|
| 第 三 章 | 正在消失的本地人     | 087 |
|       | 新观念的诞生       | 088 |
|       | 难以捉摸的本地人     | 098 |
|       | 本质问题         | 106 |
|       | 关 键 点        | 119 |
| 第 四 章 | 文化的民族化       | 121 |
|       | 文化层面上的冷战     | 122 |
|       | 现实主义与国民性     | 132 |
|       | 反对人文主义文化观的浪潮 | 141 |
|       | 关 键 点        | 153 |
| 第 五 章 | 国际文化社会       | 154 |
|       | 国际社会的文化基础    | 155 |
|       | 人类学文化观的进入    | 166 |
|       | 地方性的文化与全球文化  | 175 |
|       | 关 键 点        | 186 |
| 第 六 章 | 战略、文明与差异     | 187 |
|       | 战略文化         | 188 |
|       | 作为差异“冲突”的文化  | 201 |
|       | 含糊其辞与原教旨主义   | 212 |
|       | 关 键 点        | 221 |
| 结 论   | 事实与未来        | 222 |
|       | 本地人的命运       | 224 |
|       | 游客的命运        | 234 |
|       | 文化的未来        | 240 |
|       | 关 键 点        | 251 |
| 参考文献  |              | 252 |

## 鸣谢

我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才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在此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想这么做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已经充分利用放在我面前的机会来做这种有关“文化”的事情，并且感谢所有的人以及“他们所做的一切”。

首先，我要感谢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没有其慷慨帮助，就不可能有我的研究成果。

这些年来，我有幸得到一些我仰慕已久的教授的授课和指导，他们中的一少部分人怕是已经忘了。他们是克里斯·布朗教授、亚当·库珀教授和安德鲁·梅森教授，他们都是我非常感谢的人。克里斯教授教我懂得了“实用主义和聚焦”的作用，亚当教授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安迪教授则会在我们出现意见分歧时发挥他的幽默搞笑特长，让气氛变得融洽。谢谢三位教授的鼓励、耐心和支持。

我还要感谢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理查德·萨克瓦、克里斯·泰勒和安德

鲁·威廉姆斯。

还要向 Wakefords Comprehensive 和 Sixth Form 的彼得·惠特克、已故的史蒂夫·贝里、富兰克林先生、克里斯·鲁尼，Ann Stirney 和 LCDTC 致以真诚的谢意。

还要感谢南安普敦大学的每个人，尤其是安妮塔·凯特尼、彼得·克莱格、维罗妮卡·克莱格、罗达·科茨、戴维·弗朗西斯、迪莉斯·希尔、达里尔·豪利特、戴维·欧文、斯图尔特·普尔、卡罗琳·托马斯、莉萨·舒斯特、杰奎·史密斯和桑迪·威尔金斯。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从威廉·P. 基尔、亚当·库珀、安德鲁·梅森、托马斯·R. 塞茨和约翰·辛普森等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建议，这使我免于犯不少令人尴尬的错误。感谢彻丽·布拉德肖和艾莉·王二位对我的耐心。本书中的战略文化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斯图亚特·普尔与我的讨论，不过我还不确定他赞同我所写的东西。我也要感谢美国克拉克大学的莉萨·曼和莫特·林以及劳特利奇出版社的两位匿名鉴定人的无私帮助。谈及早期的准备工作，我则要感谢威尔士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卡罗琳·黑斯特与国际捕鲸协会的雷伊·甘布尔为我提供丰富实用的信息。

约翰·里夫斯通读了手稿，因此我要向他致以特别的谢意，感谢他这位“模范读者”帮助我找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谢谢他为此付出的辛劳。

我也非常感激所有人的意见及精彩的反馈，当然，书中的观点和错误，则由我自己来负责。

我还遇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和他们一起工作，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帮助我思考这个世界，因此也真心地谢谢他们：

Leigh Park 和 Havant CND；南方电力（Southern Electric），尤其是彼得·卡丁、珍妮·弗里曼、休·琼斯、朱莉·凯拉韦、希瑟·林-菲尔德、彼得·奥姆、朱莉·斯奎布、珍妮特·史蒂文斯；我也要感谢南方电力对斯

大林主义的洞见——非常有用；非常感谢税务局的温迪和朱莉、哈文特自治市镇议会的特里沙·沃茨和朱莉娅·马蒂森、已故的约翰·哈维以及极为上进的安德烈亚·帕拉特；国家统计局的CCS团队成员（以及每一个需要“缴税”的人）；公民教育计划以及问题与观点课程的学生们；Savory的好心人以及Montejinni车站完成旅行的电工们，尤其是苏珊·尼尔（不管她在哪里）；还有曾陪我工作、跳舞、欢笑或一起疯的人们，你们知道自己是谁。

感谢我过去和现在的朋友，尤其是Michelle Aighton、斯特拉·安东尼、约翰·保罗·凯西、戴比·康罗伊、史蒂夫·科纳、杰夫·克劳福德、史蒂夫·柯蒂斯、戴夫·库克、马德琳·杰梅特里欧、Saartjie Drijver、马克·厄斯金、利萨、英格丽德·吉尔伯特、杰夫·吉尔伯特、莱斯莉·哈德利、萨拉·哈米德丁、凯西·黑弗灵、维达·亨宁、罗伊·亨宁、杰伊·霍格、汤姆·亚历克斯·金、内德·金、弗吉尼亚·利乌、海伦·莱昂斯、戴维·陆得恩、彼得·曼德维尔、艾利森·穆尔、芭芭拉·穆尚、安德烈亚·帕拉特、伊恩·帕拉特、汤姆·帕尔格雷夫、弗朗西丝·帕尔格雷夫、夏洛特·普林斯、安妮·里夫斯、葆拉·罗伯茨、海伦娜·罗曼纽克、苏珊娜·斯努克、彼得·斯坦利、盖乌·斯坦沃思、琳达·蒂姆、艾米莉·伍利、埃琳·伍利和带我度过此生中最精彩的旅行的斯特拉·泰姆韦尔。

特别感谢以下朋友的帮助和友谊：帕姆和Hansjörg Schoss，还有路易丝、伦哈德、西奥多和马蒂尔德；汤姆·塞茨和斯蒂芬妮·安德森，还有玛德琳、克洛艾与“Chirpa”猫；莫妮卡·雅各布斯和克里斯蒂娜·韦斯顿，她们在我辛劳写作的日子里给予我信心、支持和帮助；感谢我交往最久的朋友克莱尔·肖、克里斯、艾米与露茜；同克莱尔、克里斯蒂娜、莫妮卡、帕姆和汤姆之间的对话在这些年里为我带来了快乐。

感谢里夫斯家族：琼·帕克、本·帕克、约翰·里夫斯、琳达·里夫斯、帕姆·洛夫特斯、约翰·洛夫特斯以及他们的家人。最后，还要同样感谢我

的哥哥克里斯，即便总是听到我的抱怨和叹息，他还是会努力地和我一起研究讨论。

还有两位我是要特别感谢的，首先是朱迪思·金，两年来她总是和我一起讨论我的研究，并给予我实实在在的启发，非常感谢您。而另一位我无论如何都要感谢的人就是我可怜的爸爸戴维·威廉姆斯·里夫斯，他常因为帮我专研某个词（和我的臭脾气）而遭罪，我真不知要如何才能表达出对您的谢意——妈妈因有您这样的伴侣而非常骄傲。

## 导论

194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称：“我们便是自己的文化。”（米德，1942/1943:21）。她甚至使用“是”的斜体字来强调文化在以某种方式对我们进行着界定。无论我们是谁，我们只可能体现我们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别人的文化，文化只能用来强调个体及其背景的独特性。

不过，我们应该说，米德提出的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说法，因为“我们是我们的文化”并不是完全自明的。虽然今天大多数人知道她的文化观点，但我们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界定“文化”这一概念的。在“我们便是自己的文化”的说法出现之前，“文化”一词常用来指艺术、音乐和文学，或被19世纪的教育家、评论家马修·阿诺德描述为“甜蜜和光亮”的东西（阿诺德1869/1994:29）。用阿诺德的话来说，文化是“在与我们最相关的事情中，通过了解世界上最好的所思和所说来实现我们对充分完美的追求……”（阿诺德1869/1994:5）。“文化”远没有使我们体现出自我。在阿诺德看来，它不过是把我们从工业化进程的智力与精神的混乱中解救出来。

一方面文化代表所思、所说与所生产的“最好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我们便是自己的文化”的观点。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两种观念不仅差异巨大，而且从现在“我们便是自己的文化”所占的支配地位来看，人们很容易忘记自己可以站在其他角度对文化进行思考。显而易见，自米德提出自己的观点以来，文化的人类学观念就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远到伯明翰近至北京，它在流行学术话语当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现在，我们了解了米德这句话的所有含义，这也让我们知道文化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涉及“文化”的称谓及意义，而且事关我们对世界的思考方法。

“文化”一词在历史上存在两种性质的概念：人文主义的和人类学的。在20世纪，我们见证了文化的古老的人文主义概念（阿诺德的概念）在大众阶层和学术界逐渐被米德的人类学概念取代。而且，人类学概念的具体形式或者说版本在20世纪的后半期占据了统治地位，该版本被看作是文化的本质主义构想——似乎存在着一种使我们体现出自我的具体的文化本质。

当米德书写自己的表述时，文化的人类学概念在德国和美国之外还不为人所知，更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很多人还等待着被说服。很多人被说服（至少表面上）会被看成巨大的成就。当然，“我们便是自己的文化”的观念在当下的流行并不是玛格丽特·米德个人努力的结果。她没有发明“文化”这一概念，甚至如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看到的，“文化”一词源于13世纪的意大利人，不过米德所属的那个小群体却在努力使我们相信我们就是自己文化的本地人，虽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是他们的愿望，但是这种成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广泛谈论“多元文化”与文化“冲突”时达到了顶峰。不过“我们便是自己的文化”这一观念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尤其在本质主义表达方面。人类学者乔尔·卡恩（Joel Kahn）指出，这种观念完全处于一种“想当然”的状态。（Kahan, 1989:17）

今天，仍有很多文化等待被发现，文化无处不在——它创造着我们的历

史，并把作为群体、组织和个体的我们彼此区别开来。在濒临灭绝时，我们必须保护它，使其免受全球化的威胁，并用它来对抗均质化，在多元性中为其喝彩，在共享的地理空间中找到与其他文化共存的方法（英国就是如此）。“文化”似乎界定着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已为众人所知，而且它还可以把我们与他人区别开来，这一点也已经被人们所熟知和接受。如果还有一些人不幸对此孤陋寡闻，那么也不要紧，因为这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就像一个朝阳产业，他们将很快有机会看到它的蓬勃壮大。作为观念全球化的案例，“文化”自身发展得十分迅猛。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提醒自己，尽管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与人类学联系在一起，但不是所有的人类学家都研究文化——也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对该词语的（本质主义）理解。

在阿诺德所处的时代以及 20 世纪早期，文化曾属于文艺、智力探索和个人成就的领域，尤其是这些东西的“更高级”的表达形式。“文化”曾是一种在画廊中被观赏或在剧院里被观看的人工制品，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教育和学习可以获得的才能与品质。它与愿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成为成功的制度，而且显示出一个社会能够或应当取得的成就。

当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 1830 年指出文明应当“基于教化”的时候——因为其结果是“打磨”而不是仅仅给某个人“涂上一层漆”——他指向的是对文化另类的、人文主义的理解<sup>1</sup>。这时，柯勒律治的“教化”（cultivation）概念就成了“文化”——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文化把文明与野蛮、教养和粗俗区分开来，它为人类的普遍进步提供

---

1 柯勒律治在 1830 年写道：“但是文明本身只是一种混合的善，既不具有像疾病那样的破坏性影响，也不具有强壮体魄之色，一个杰出的民族更适合被称为‘被粉饰的民族’而不是‘被打磨的人群’，在那里，文明并不基于教化以及体现我们人类特征的所有品质和能力的和谐发展。”见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论教会和国家的构成》（引自 Williams 1958/1993:61）。

一种辨别标准。当阿诺德用“追求完美”来指称文化时，他很清楚这种文化不能自然而然地出现。与文化的人类学概念相对的是文化的人文主义观点，对人文主义者而言，说我们可能就是自己的文化无异于一个诅咒。在他们看来，文化是某种我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获取的东西。

文化从一种概念到另一种概念的变迁并非表现得剧烈而明显。我们不会一朝醒来满脑子就装着新的文化观念，因此尽管总体趋势可以被觉察，但具体的变迁日期却不可考。不过，在文化理解方面，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意味着我们在理解他者或我们自己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科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从古老的人文主义概念向年轻的人类学概念的变迁是如何出现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书关注的焦点。追溯文化历史学以及人类学观念的兴起，或者说，研究这两种文化观念的发展，是本书将要探讨的内容。

本书将从社会科学的学科视角，即国际关系（以下表述为 IR）的视角来讲述文化观念，从该学科的内部展开，跨度从其建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文化的人文主义概念占支配地位的时期）时期直至米德文化概念达到顶峰的 20 世纪 90 年代。就许多方面而言，国际关系的体验以及该学科与“文化”观念间的关系体验和社会科学或人类史中的其他体验没有什么不同。国际关系学者既没有发明“文化”的概念，也没有为这一概念添加什么东西。人类学家为“文化”一词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而国际关系理论家和评论家只是随大流。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大流”使得米德的“文化”概念成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战略家、历史学家、记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的一种重要思想工具。

对国际关系中文化概念进行详细的描述，在很多情况下成了一种反映其他社会科学和整个社会变迁的标志。我们发现，国际关系的生命力开始于文化的人文主义概念，逐渐过渡到人类学的概念。当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该概

念从人类学整合进自己的作品中时，另外一些人却坚信自己对该概念的直觉理解，并从普遍的社会语境中把其吸收进自己的著作。本书的焦点集中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研究者以及影响其思考世界的文化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有关米德的文化概念如何支配国际关系以及该学科如何拥抱一种文化概念而失去另外一种更为古老有用的人文主义概念的故事。

## 目的和说明

我们可能想知道，为何理解一个术语意义的变迁及其后果很重要，以下就是几个十分有趣的原因。

首先，这有助于人们知道这些术语来自哪里，它们是如何获得特殊意义的。这种知识本身让我们对下面的事实更加敏感——发明观念是为特殊目的的服务。当然，今天，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更关注隐藏在概念背后的政治学。我们注意到，我们的概念携带着社会和政治含义，尤其是文化观念，在国际关系中，这点表现得非常突出。地方性实践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一部分，这种说法可能比把这种实践置于我们的批判之外的做法更具意义。当提到跨文化权利问题（如人的、动物的、环境的权利）时，问题就更突出了。有关儿童被性虐或对人类与动物实施虐待与文化不相干（即使不是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论调是一种令人不太愉快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概念在社区与普遍话语的想象依据之间设置了障碍。不理解文化概念，我们就面临基于其上的观念挑战，也不能思考更有力的另类政治选择。